

试论敦煌 T 藏经者

马金龙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8)

摘要:古代敦煌是多民族佛教译经地,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气息,历来受崇信者的青睐。二十世纪初在此出土的汉、藏、吐火罗、于阗等佛经文献和杂卷不计其数,令世人为之震惊。随之敦煌学研究收获颇丰。但一直以来学者、专家对藏经年代和原因众说纷纭,至今没有达成统一共识,更未提及藏经者是谁。本文从藏族的宗教习惯、在敦煌的统治及文化影响等方面谈及藏族藏经人的可能。

关键词:敦煌 文献 藏经人 藏族

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献,解开了很多文化历史之谜,无疑给研究中华文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内外学者潜心研究,使敦煌文化研究圈不断扩大,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不断提高,敦煌热此起彼伏,其作用和感召力远远超过王道士和张大千等人的想象。笔者在阅读很多关于与敦煌文献相关资料时,对敦煌藏经者到底是 T(TIBETAN PEOPLE)人还是 H(HAN NATIONALITY)人产生了极大兴趣,至今没有学者提及此问题。所以,促使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相关资料与观点进行阐述。

一、藏经原因和时间之说法

藏经年代及原因考证对研究 T、H 有着极大帮助,这也对当时历史环境、人文地理等内容的考证和校勘有很大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封闭于 1036 年敦煌将陷于西夏之时。^[1]陈坦认为经洞封闭为 1053 年以后。此后,英国学者斯坦因及我国学者罗振玉、姜亮夫等也持经洞封闭于西夏之时的相同观点。白滨则认为是 1002 年以后,贺哲世在《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随着敦煌东边党项势力的强大,西边信奉伊斯兰教哈拉汗王朝消灭于阗政权后逐步推进敦煌,为防止党项和哈拉汗王朝军队的破坏,敦煌各个寺院便把文献集中到莫高窟中。

有人还认为是敦煌所藏文献是弃品,认为如果避难而藏的话对于寺庙来说藏品应是佛教中

最珍贵的东西,应该是佛教大藏经,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一部完整大藏经和佛经珍品。全都是单卷残部、碎篇断简,甚至可以说是残卷废纸,故认为是将多年封存而又无多大价值或已经过时不用的佛卷文献堆集起来,年深日久,将其遗忘。

二、推理 T、H 藏经者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大致对藏经年限和原因有了大体的了解,可以肯定的是藏经时间是在十世纪末或十一世纪初。上述藏经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完全肯定。笔者认为对藏经时间、藏经原因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但藏经者是谁的问题到现在还未提及,只是笼统地认为是佛家僧人或信奉佛教之官人,却忽视了 T 人还是 H 人。我们知道敦煌文献是在某一个年代以某种原因某人将文献和画卷等在佛洞窟中藏了起来,又有某人碰巧发现而公布于众。藏经者的研究对进一步澄清藏经年代和原因有很大的帮助,其环节缺一将有可能对历史文化研究带来误读。从斯坦因的记录来看,藏经洞的佛典是按类存放起来的,汉文佛经和藏文佛经包裹分类存放,回纥、于阗、吐火罗文等杂卷放置在一起。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分类放置?可能藏经时间有前后顺序,但研究者都不赞同这种观点,从发现的文献中也能够察觉到这一点,那么又是为什么呢?看似简单但细小的一些东西,使人联想翩翩。

就从藏经归类放置来说,汉、藏文献分类放

收稿日期 2008-08-07

作者简介:马金龙(1979-),男,回族,青海共和人。青海师范大学 2007 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置,其他民族的堆集在一块。不外乎有这么一种原因:便是 H、T 人或其他民族信奉佛教之人(组织者)封存了经卷。分析汉、藏寺院的经卷集中一起放置,其他民族的堆放在一起的原因,可以看得出 H、T 者的经卷为多数,其他民族的经卷是少数,这在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中有详细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但我们知道早在吐蕃或归义军统治时期其他民族当时在敦煌没有专门的寺院,而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自居,但汉、藏寺院在敦煌有多处。在 T、H 者占多数的环境里因避突发事件其他民族之人组织封存的可能极小。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推理 H 或 T 人最有可能,目前敦煌学者对此没有进行研究,这里指的 H 或 T 是组织者,因为从藏经的规模和分类等来看藏经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但笔者通过学习藏族文化和查阅有关资料中发现 T 人的可能性较为 H 人大些,这是从吐蕃文化对河西的影响等层面进行论证,得出 T 人藏经的结论。

三、吐蕃文化对河西的影响及藏经者 T

荣新江先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指出:“吐蕃对敦煌的长期统治,对敦煌佛教有着决定性影响,像吐蕃高僧法成在吐蕃统治结束时,并未随吐蕃势力而退走,而是听从曾跟从他念经的弟子张义潮的劝请,留在敦煌讲经。”这也可以说明虽然吐蕃势力渐去差不多一百年,但藏族文化对敦煌地区文化影响的深度也是史无前例的。有人还认为,当时于阗、西夏等民族广泛运用吐蕃语。^[1]从这些材料中隐约感觉得到吐蕃公元 842 年前的繁荣强大对周边民族和边境汉族地区影响深广,在文化上有可能已经形成同化趋势。再说,张义潮是吐蕃僧人的弟子,汲取吐蕃文化的成份肯定较多,对于一名信教徒来说在文化上维护和继承也是必然的,也有理由相信当时河西地区沿用公元纪年法等沿用吐蕃十二生肖是可以理解的。还可以这样理解,张义潮是沙、瓜、伊、西、兰、鄯、河、泯、廓等 11 州观察使,这些地方多数都有吐蕃曾经交流和统治的痕迹,让民众在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字上一下子接受汉文化较为困难。故此,用当时社会上较为流行的吐蕃文字语言维护其

统治当然是比其他语言更为便捷畅通。在日本学者池田温的《敦煌文书的世界》中云:“通览敦煌契约,最为古老的是 8 世纪中叶的,9、10 世纪的也有,即使是在名义上奉中原王朝的时期,但西陲之独立地方政权的特征也很强烈。因此,有许多契约的纪年没有年号,仅用干支或十二支(多是吐蕃时代的)的纪年占了一半以上”,以此也可解释上述理由。敦煌经历了吐蕃王朝八十多年的统治,潜移默化当中已基本接受吐蕃文化,虽然文化对抗明显,但文化根基不随王朝瓦解而烟消云散。相反,多元文化在敦煌地区出现此起彼伏的状态,对“敦煌的藏文卷子中有一些不属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是归义军节度使、甘州回纥与于阗国相互交往或使用的文书”^[2]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虽然吐蕃统治势力退去,但吐蕃文化还在该地区如前发展。

再者,“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与中原的联系被割断”。^[3]在归义军节度使统治时期唐朝内忧外患,自身难保,对河西一带顾暇不及。由此也可以判断出,当时唐朝对敦煌在文化上的控制力不强,漫漫百年受到吐蕃文化的熏陶,吐蕃文化还以原有的面貌盛行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汉文化盛行的前景,也许有人会问:敦煌出土文献为什么汉文献较多,这不已证明汉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力量吗?确实是这样的,毕竟敦煌在吐蕃占领以前,汉人已统治数百年,虽然已失去往日光彩,但文化根基依然犹存。可我们不能因为文献的多少来决定谁是藏经者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一种民族的眼光来审视敦煌藏经原因和藏经者等问题有点欠佳。再说,敦煌毕竟在一千多年前是各民族佛教徒讲经、诵经、辩经之地。著名藏族当代学者端智嘉就说:“一千多年前藏族和汉族,还有西部的一些其他少数民族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共同学习和翻译,共同商讨宗教事宜的情景展现在我的脑海里”,^[4]古代敦煌是一个多人种、多元文化的混杂地区是不可否定的。

就藏经洞的藏经方法来说,据笔者了解,在藏族历史上,为了传播某种教派将录有本教派意志并符合神之语的佛教、历史文字经典藏匿在寺

庙柱间或深山峡谷之中,以佛之启示之语,将其公布于众的方法。现在可以见到的以前著名伏藏作品很多,比如:《柱间史》、《玛尼全集》、《四部医典》等。笔者曾经在今青海兴海县一带就目睹过以前尼玛派的藏经洞,洞内刻有佛像、藏经卷放置整齐有序,金字书写经书颇多,经卷有上百种之多。这在藏族佛教历史上是见多不怪的。吐蕃在赤松德赞时就出现了伏藏,敦煌文献同样在出现某种危机之时如果是 T 人组织者延续伏藏的办法封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里一种文化根基在起作用。

法国藏族学者石泰安和我国敦煌学研究专家荣新江都提到汉文化(唐朝)对藏族的影响,特别是石泰安在相关论著中明确提出唐朝对吐蕃的影响甚至超过印度。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古代的吐蕃经济昌盛,民富国强,尤其是在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时期,西边能跟唐朝较劲的唯一民族非吐蕃莫属。”^[6]当时的吐蕃君王政治开明,吸收外来文化,有选择性地发展宗教文化,宗教还没能在藏地遍地开花,而是正在和本地本教对抗阶段,是以纯粹或半纯粹的外来身份自立阶段。再说,唐朝威名四震,繁荣富强,在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这件历史性的婚姻中,文成公主带去的医药、工匠、星算等,不难发现吐蕃在汲取外来先进文化上是积极的。允许摩诃衍在藏地传法,敦煌文献中发现的古典著作《尚书》、《春秋后语》等的藏文译文等,可以证明在当时唐朝对吐蕃的影响已经很长。

“吐蕃对河西和西域的统治结束后,这一地区各个民族政权间相互联系时,使用的是大家都懂得的共同语言——藏语来通信,这清楚地表明了吐蕃的影响”。^[6]“敦煌文化研究所里,唐朝的很多文献是无量寿佛类的,大概有十几卷,每卷后缀有作者和书写者的名,分析这些名字有汉族也有藏族,从中也可以看出有些经卷是汉藏僧人共同完成的……”^[7]从此,我们也是否可以这样判断:公元 1035 年前后,虽然吐蕃在敦煌的政治控制力随吐蕃王朝的四分五裂而瓦解,但吐蕃的文化还一直影响着敦煌的每一寸土地,甚至是官

方。加之喜欢接收和学习优秀文化的藏族僧人,看到汉文化博大精深,通过收集汉文卷本和附带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卷本,召集一些文人将其翻译的过程中因发生战乱或其他原因将其封存,后因西夏控制该地区而被人们渐渐遗忘,至王道士发现为止。

四、译经的盛行及藏经者臆断

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强大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赞普赤松德赞时就在桑叶寺建立翻译学院,集中印度、唐朝、伊朗等各民族僧人翻译佛经,对后来佛经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只要是统治者和佛教僧人都将修建寺庙和翻译佛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专门供养翻译队伍,通过翻译汲取先进文化促使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为后来的佛教在吐蕃以“王者”身份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我们也可以察觉到佛教的中心早在很多年前已转移至青藏高原,其原始性、纯真性可见一斑,这当然与当时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记载的“藏文文献中发现的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的汉语”、“很多汉文佛经背面以藏文来书写佛经”,^[8]“发现很多像粟特文佛经写本,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藏文文献中发现的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的汉语数词一至十”,^[9]还有《藏文或婆罗谜文音译汉文文献》、《藏、汉文字音译梵文文献经典》及《藏汉双语写本》等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汉、藏、粟特等民族翻译佛经的规模是空前的,很多研究者恰巧忽视了这点,只知道河西宗教活动频繁,宗教遗迹颇多,却忽略了河西在宗教发展和流传中的“中介”作用。我们都知道佛教发源于古印度,想把佛教在不同民族和国家发扬光大,必须要经过翻译这个过程,十世纪或十一世纪初正是佛教在唐、吐蕃、西夏等地生根发芽的关键阶段。随着吐蕃的不断强大和对河西等地的控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也跟随统治者的步伐一并传来。各民族僧人,抛开政治目的和私人利益,共举佛教这面旗帜,在求同存异中生存、开拓创新中学习。尤其是吐蕃最后一个君王朗达玛灭佛以来各路信佛者背负宗教和

民族之责任,开拓佛教疆域。河西作为政治、文化的庇护所,各种政治势力很难到达,故 T 人凭借以往驻留此地并以以前归义军首脑信奉藏传佛教的条件优势,召集人员在河西寺院收集各民族佛教文献,亟待翻译。公元 842 年朗达玛灭佛以来西藏地区 78 年无佛音,藏学界一致认为佛教重新在西藏地区发展是十一世纪中期,对于 T 人的佛教徒来说,河西当时随着吐蕃王朝的覆灭失去统治,但时间较短。佛教文化和居住环境等基础还在,想复燃佛教余辉当然在此地更为有利,因此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交相辉映,虽然 T 人没能完成翻译、吸收和传播的任务,但从安多将佛重新迎回西藏并传播至今来看,今青海、敦煌是朗达玛灭佛后 T 人学经拜佛的重要场所是肯定的。另外,佛教在公元二世纪传入东土,唐高僧玄奘曰:“佛生西土,法流东海”。充分说明当时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发展比藏区广泛,藏佛教徒为了等待时机,重新将佛带回西藏,将已经在藏区销声匿迹的佛经在此翻译有很大的可能,因为对接壤汉佛教文化直接接触比翻越雪山接触印度佛教文化更有优势。

在这里我们可以猜想:古藏文能够在敦煌和新疆等地出土并非偶然,朗达玛灭佛的火焰未触及离吐蕃较远的河西、疏勒等地,所以幸而保存了下来。另外,从敦煌藏文文献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从汉、粟特等翻译的文字超过其他文字翻译的迹象。也许,藏经之前几十年就有 T 人翻译组织领导翻译了很多汉文卷本,直到出现某种意外将译剩和留有的佛经文献及带有其他文字的材料封存了起来。我们也可以这样推断,吐蕃兵败河西结束其统治后著名僧人法成的藏汉弟子,继续在敦煌各个寺院讲经授法,理由是:“吐蕃高僧法成在甘州、沙州等地译经传法,在归义军初期仍在敦煌继续讲学,培养了一批汉族弟子,其佛教学说也由其汉族弟子继续传播。”^[10]“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为西藏喇嘛占据……”^[11]“吐蕃统

治时期的敦煌文化,几乎是佛教一枝独秀。沙州的僧尼寺院从 13 所增加到 17 所,僧尼从 310 人猛增到数千人。而且,敦煌在吐蕃的庇护下躲过了‘会昌法难’,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2]“吐蕃的崇佛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归义军,佛教在归义军时期盛行,莫高窟在归义军张氏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造窟高潮,有人称之为‘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3]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藏僧团对敦煌文化的统治并没有退去,而是以一种融合的形式继续发展,对藏族僧人担任当时的教会主管我们就不难理解了。正值藏经年代,西夏的远征和支持宋朝的唃廝囉政权气势冲天,随时有可能跨越江河冲向敦煌,谁是真正主宰者尚难定论。社会动荡、战天斗地的局面使迁居在敦煌的僧人望而心怯,束手无策。为了避免因战争仇恨给各民族佛教文化带来灾难,在 T 僧人的带领下将译剩的佛经文献藏匿在洞中,翘首局面。如果宋或唃廝囉占领敦煌,就可以随时取出,继续译经传法,但事实却出人意料,敦煌被西夏占领,故而封存渐渐被人遗忘。

总之,敦煌的藏经原因和藏经者身份考定众说纷纭,是一团解不开的谜,“对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提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说,但决不能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14]此说甚是。

参考文献:

- [1] 李晓伟. 探寻西王母古国[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2][6][9] 胡戟、傅玫著. 敦煌史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3][5] 樊保良. 中国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4] 端智加. 端智嘉全集(第三卷)[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7.
- [7][8][10][11][12][13][14] 荣新江. 敦煌学十八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才旦)